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

**Die Kulturrevolution und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in China**

**– zum 40. Jahrestag der Kulturrevoluti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Historical Cycles in China**

**– To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胡景北(Jingbei Hu)

经济发展文论 **Jingji fazhan wenlun**  
**Arbeitspapiere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Working Pap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nstitut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02/2007**

国际标准刊号: ISSN-Nr 1860—2207

*《经济发展文论》的出版获得了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的德意志银行的资助*

*Publikation dieser Schriftenreihe "Arbeitspapiere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st von der Deutschen Bank, Frankfurt/M, Deutschland, gefördert*

*Publication of this series "Working Pap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unded by the Deutsche Bank, Frankfurt/M, Germany*

## 目录/Gliederung/Contents

中文提要/Chinesische Zusammenfassung/Chinese Abstract  
英文提要/Englische Zusammenfassung/English Abstract

1. 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  
Die Kulturrevolution: Roter Terr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ed-Terror
2. 专制下的局部政治自由  
Teilweise politische Freiheit  
Partial Political Freedom
3.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Die Kulturrevolution und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Historical Cycles in China

德文译者为本文撰写的前言的中文翻译  
Chinesische Übersetzung der Einleitung vom deutschen Übersetzer  
Chinese Translation of Introduction by the German Translator

Deutsche Übersetzung:  
Die Kulturrevolution und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in China  
——zum 40. Jahrestag der Kulturrevolution  
Einleitung vom Übersetzer  
1. Die Kulturrevolution: Roter Terror  
2. Teilweise politische Freiheit  
3. Die Kulturrevolution und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in China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单位专制 中国历史  
Stichwoerter: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Arbeitseinheits-herrschaft (*Danwei*-  
Herrschaft), Chinesische Geschichte  
Keywords: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Despotism in Working Units (*Danwei*  
Despotism), Chinese History

---

作者/Autor/Author: 胡景北 (Jingbei Hu)

电子信箱/Email: [jbeihu@mail.tongji.edu.cn](mailto:jbeihu@mail.tongji.edu.cn)

个人主页/Homepage: [www.hujingbei.net](http://www.hujingbei.net)

#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sup>1</sup>

四十年前即 1966 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这一年起，全中国的中学、大学不再招生。原定 1966 年秋天进入中学的全国几百万名六年级小学生，必须等到 1969 年才能升学。

我很幸运，1965 年进了中学，因此，虽然我“没有赶上巴黎公社、没有赶上十月革命、没有赶上打蒋匪”，可是赶上了中学，“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赶上了打倒刘少奇”。千百万大学生、中学生和全中国人民一直革命到 1968 年。那一年，革命终于无以为继，而农村成了城市大、中学生唯一可能的归宿。

在我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就是 1966 到 1968 的三年，那暴风雨般的三年，那不上课、不工作、所有学生都成了职业革命家的三年。现在所说的文革十年，加上了 1969 到 1976 的七年。其实，那七年无论对红卫兵、对走资派、对中国历史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那只是强弩之末，只是因为毛泽东没有勇气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而有名无实地延续着而已。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 1966 年 10 月 18 日，我卷在一百多万红卫兵的汹涌人潮中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巨大场面。同时，我的脑海中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在沙皇检阅军队时的感觉：沙皇“只要说出一句话，这支庞大的军队（他自己虽是微不足道的一粒砂，但是他和这支军队息息相关）就要去赴汤蹈火，去犯罪，去拼死，或者去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所以一知道这个人就要说出这句话，他不能不颤栗，不能不为之心悸。”是的，文化大革命的回忆也不能不让亲历者颤栗和心悸。托尔斯泰小说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被划为禁书。如果说，1966 年时 13 岁的我还不明白巨大的群众运动既可能建立伟大而英勇的业绩，也可能犯下凶残和暴烈的罪行，那些读过托尔斯泰的大学生们、成年人们难道不明白吗？我的中学班主任是俄语老师，他肯定读过托尔斯泰，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说法不一定正确？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他这样说，他立即会被我们学生当成“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可是，在形势走到极端之前，为什么他不对我们说说托尔斯泰呢？现在，我自己是成年人，读过托尔斯泰，又处在言论虽然受到限制、但毕竟比文化大革命时期宽松得多的社会环境，因此，面对虽然不可预知、却可能重演历史的未来，面对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包括无法理解我自己当年日记的青年人、少年人质询的眼光，我愿意说说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

<sup>1</sup> 本文起草于 2006 年 10 月 18 日，2006 年 10 月 29 日公开发表在作者的个人主页 [www.hujingbei.net](http://www.hujingbei.net) 上。本文是作者试图总结自己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体会。感谢网友们 8 个月以来的转载和传播，感谢司马涛（Thomas Zimmer）先生将它翻译成德文。这次发表时，仅仅对“单位专制”概念作了少许补充说明，其余未作改动。中文文本后面的德文文本根据本文 2006 年 10 月 29 日的网络版翻译，并发表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德中协会主办的《China-Report》第 45 期（2007 年 1 月）上，司马涛先生并为此写了引言。我对司马涛先生表示感谢。德文译文经过我的校阅，但本文的最终有效文本是中文。本文的错误由作者负责。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既是毛泽东维持个人专制采取的一个残酷手段，也是中国人建立“理想社会”的一次野蛮尝试。一方面，它把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实验推到极端从而彻底暴露了它的不可行性，另一方面，它把中国历史荡秋千似的轮回在二十世纪推到极端，因此给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添加了更多变数和更大风险。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是全民性的红色恐怖和人民的部分政治自由。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它和中国历史轮回的关系也围绕这两个特征展开。

## 1. 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

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独裁专制的一页。在那个时期，中国人不但一切行动以毛泽东的话为准，而且一切思想也以毛泽东思想为准，任何有违于毛泽东的话和思想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的，都立即受到暴力惩罚。类似状态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但从来没有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暴烈程度。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和以往历史上的专制有两个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它发生在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每个中国人都被组织在工厂、学校、生产队等单位里，连老人和幼儿也被居委会或者生产队管理着。通过无所不包的组织，毛泽东思想贯彻到社会每一个角落；通过每一个人对其它每一个人的监视，任何对毛泽东不敬的言行都会被发现，被公开处罚。而红卫兵作为从内心里崇拜毛泽东的青年群体，首当其冲地承担了发现和处罚这类言行的责任；第二，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专制不但在思想上认同，而且上升到情感上的一致。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每天早晨听到的“东方红”乐曲，作为文化大革命一大特色的“毛主席语录歌”，到处展开的用个人经历讲述的“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用个人心理变化描述的“斗私批修”（斗私心杂念、批修正主义），政治对纯个人领域如上学、劳动、衣着、娱乐、甚至恋爱（无产阶级的爱情）的全面统治，在强烈抑制人的普通情感的同时，又把人对爱、对心灵抚慰的需要，转变为对毛泽东个人的情感。而正是第二点，让每一个人对其他每一个人的监视成了人民大众的自觉行为。也正是第二点，不但使得许多与毛泽东从未有过个人交往的人在毛泽东去世时痛哭流涕，而且使得在1968年以后吃尽苦头的当年红卫兵，就像大多数人难以忘记初恋那样，难以放弃自己对毛泽东的情感。

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程度可以用一个词表示：“红色恐怖”。它是红卫兵引以为骄傲的一个词汇，是保证革命理想实现的革命方式。它和红卫兵所说的中国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白色恐怖相对立。然而，那时的白色恐怖仍然容许鲁迅的生存、容许大学教授在书刊上公开宣称自己观点属于马克思主义，红色恐怖则认定非马克思主义言行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这样的言行不但不准公开，即使私下里对配偶、孩子、朋友说过，后者也必须把它们揭发出来，因为这样的言行必须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惩罚首先是暴力的，而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文字和行政处理层次上。所以，红色恐怖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新高度。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里，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已经不允许出现在报刊和课堂上。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极端，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外，任何人的作品都被翻出来检查一遍，任何人的言行都被拿出来清理一通，以便发现他们反对毛泽东的可疑之处。而一经发现，被指责的人就不但在尊严上，并且在肉体上受到伤害。老舍、傅雷等一大批文化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杀，刘少奇、彭德怀等一大批人的去世，绝不仅仅因为尊严扫地，而且也因为甚至首先是因为难

以承受的肉体惩罚。我所在的南京市第九中学，好几位教师在文革中自杀，其直接原因都不是因为受到的大字报批判，而是因为受到的暴力或暴力威胁。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特别是恐怖性质，不但今天，就是一千年后也无须证明。翻开 1966 年到 1968 年期间的任何一份中国大陆报纸，读者的第一个感受将是恐怖，是毛泽东“句句是真理”的绝对权威，是红卫兵和普通中国人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是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任意认定和惩罚，是没有人性、没有理性的恐怖。

## 2. 专制下的局部政治自由

在认清文化大革命恐怖性质的同时，我要指出它的自由一面。按照官方的正式用词，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动乱转个身是乱动，而乱动必然意味着自由。没有行动自由，谁能乱动？没有思想自由，谁想乱动？有了自由，才能够乱动；而几亿中国人的乱动，才形成动乱。然而，这里所说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又需要和上一节讲的专制与恐怖协调起来，否则的话，我们便很难理解文化大革命。

中国的专制往往被视为抽象的国家专制或者皇权专制。这一点虽然正确，但它必须用具体的社会专制来补充。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专制的，每一级政权对下都是专制的。一个中国人不但生活在抽象的国家专制中。他也生活在具体的单位专制、社区专制中。一个普通中国人日常体验到的专制不是国家层面的，而是自己所在企业、村庄、机关、学校、社区领导的专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中国人不会把日常体验的专制和国家专制直接联系起来。中国人民喜欢包青天，古典小说喜欢描写“挡轿喊冤”，就是因为普通中国人眼里，亲身体验的社会专制和京城皇帝的国家专制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 1949 年以后出现的社会专制中，单位专制特别突出。单位是中国社会在 1949 年后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中国所有劳动者都被组织在这个或那个单位里。只有加入某个单位，中国人才能够参加社会劳动，和取得生活资料。问题是这样的单位不仅仅是经济性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性的，是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体系。每个单位都有执政党组织并且掌握该单位最终领导权，无论这个单位是工厂、生产队、学校、幼儿园、研究所、福利院、街道。正是通过这样的单位制度和单位专制，中国的专制控制到了每一个人。这个专制制度的运转机制是政府对各个单位的考核指标为各单位的专制程度：没有自由思想者或者自由思想者被单位遏制住（以至于政府与外界以为那里没有自由思想者）。专制程度越高的单位，越是被评价为“好”单位，单位领导人的升迁可能或物质利益越大。但是，各单位在实施内部专制的时候，单位领导人必然会出现两种倾向：1）把专制实施到比政府希望的程度更高。比如许多与政治完全无关的经济、文化、环境的改进建议等，也许是政府所希望甚至非常希望听到的，但由于它们必须首先在单位内部提出，因此反而因为其新意或与单位领导不一致的“自由”而受到压制；2）单位领导人利用自己在本单位不受监督的权力而滥用权力为自己牟利。这两种倾向是单位专制的必然结果。对生活在任何一个单位内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他们几乎每天都得承受这两种倾向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具体的社会专制尤其单位专制虽然是中国国家专制的基础，但各级专制政权和专制单位对下滥用权力的趋向严重到一定地步，却又危及人民对国家专制者的

信任和国家专制本身，因此，皇帝总是采用各种手段抑制地方和单位专制的滥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所有这些手段都是自上而下的。只有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也表现在这一点上。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我所在的中学，最早被当成批斗对象的是当时的校长。这也许是市教育局的决定，是自上而下的。可后来学校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副校长、教导主任纷纷成为批斗对象，虽然可以说是毛泽东“伟大的战略部署”，但至少这一部署的实现方式，在我的中学里，是学生和教师自由地、没有恐惧地对学校官员“修正主义”言行的揭露和斗争。其实，市教育局作为地方政权的一部分那时已经瘫痪，局长和其它领导官员都已经被打成走资派，不可能再对中学文化大革命做出指示。另一方面，即使它还能够指示，学生也会用怀疑、批判的态度对待它甚至反对它，因为它毕竟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本人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单位、各级地方政府的情况都是如此。毛泽东可以指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走资派，但他不知道上海市教育局或者黄浦区谁是走资派。这就给红卫兵与民众很大的自由余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检查那些局长们、区长们的言行，发现他们有“修正主义迹象”就可以把他们拉下马。因此，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专制时，我们不应当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民众获得的局部政治自由。

乔治·W·布什曾经说过，人类几千年来取得的最大进步，是把自己的统治者关进笼子里，让他们只能从笼子里行使权力。当然，这个笼子要关的，不仅仅是作为总统的布什，而且包括了各级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学校校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居委会、工厂、学校、区县机关到省、市政府和国务院，中国的统治者都被关进了笼子。唯一幸免的只是毛泽东和林彪。可是，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这还不够吗？这样的“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的标准用词）难道不是一种自由？中国历朝历代都反贪官污吏，但哪一次把大多数官员交由民众自由地揭发、批斗的呢？文化大革命是仅有的一次！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格的服装、多吃多占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甚至夫妻在大街上携手也属于资本主义行为。修正主义只是比资本主义弱的一个用词。但是，在反对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同时，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却是批斗共产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党政官员。文化大革命之前，官员的任人唯亲、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专横跋扈、争抢荣誉、造假欺骗等这些如今常见的现象还很少有。一个官员只要多强调物质利益（即使不是他本人的物质利益）、只要对工作有过怨言，只要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贯彻不力，他就会成为走资派，更不用说现在常见的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等行为了。然而，即使文化大革命前的官员没有现在这般“可恶”，如何监督他们仍然是中国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特权的滥用、社会的腐败、道德的堕落，首先表现在皇帝以下的各级政权官员的身上，而不表现在皇帝本人身上。因此，皇帝也需要监督他们。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视为一场整肃皇帝以下官员不良行为的大规模运动。它和以往各个专制朝代同类运动的一个区别在于用词不同：文化大革命用词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的用词是反贪官。

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他在 1949 年后试过许多种方法，但是都失败了；文化大革命才是他找到的好方式。他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过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位中学朋友认为：“如果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当官就会成为畏途”。确实，

假如今天的政府官员、企业经理、村长乡长、校长主任知道七、八年后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敢不小心翼翼呢？七、八年这个周期，和法国总统五年选举一次的间隔相差不大，和美国、德国官员若连任两届共八年的时间几乎相同。每隔七、八年把官员关进笼子一次，让民众自由地没有恐惧地批斗他们，和西方国家每隔四、五年重新选举一次官员，多少有相同之处。就此而言，和西方人发明的自下而上的自由选举类似，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发明的自下而上自由批斗官员的方法。

### 3.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

1976年以后，中国正式放弃文化大革命，从宪法中取消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权利。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维护最高国家专制，手段是践踏人格尊严的暴力和无限上纲的恐怖，因此，作为民众获得部分政治自由以约束官员的方式，它是野蛮的和丑恶的，是一种暴民政治，所以，它应该放弃。但是，中国没有发明新的约束官员方式，而重新采用以往整肃官员的自上而下方式，因此，在国家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国的单位专制、社会专制迅速恢复，并且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加严重。民众又一次失去所有政治自由。今天的中国，甚至连历史上常见的“挡轿喊冤”都被规定为非法了。然而，只要民众一天不能够有效地约束官员，只要他们还生活在单位专制中，文化大革命就会是他们的一种记忆甚至憧憬，并且是官员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因此，要让人民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憧憬，官员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国必须找到把官员“关进笼子”的新方式。

自上而下整肃官员的方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针对个别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这种方式行之有效。可滥用权力的行为一旦蔓延，这种方式就无效了。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自下而上“清君侧”（清除皇帝身边的大臣）的事情，那是地方诸侯逼迫皇帝整肃某些官员，因此不但不具有制度性的意义，和人民大众起来整肃官员也完全是两回事。在中国历史上，人民一起来，就是造反，就是王朝颠覆或几近颠覆。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全新的方式，皇帝和大众联手整肃官员。人民起来了，但王朝仍然稳固。因此，它让无意推翻王朝的人民看到了一吐心中冤屈、挣脱社会专制的希望。今天，当文化大革命的大量亲历者还在人世，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还鲜活地存在于人民头脑中的时候，这种希望还无法生长。可随着时间的推延，人民对痛苦的记忆将越来越淡，对那时毫无恐惧地整肃官员的快感的记忆会越来越强，对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和憧憬就可能生长起来。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未来社会变迁埋下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轮回在我眼前展现的一次极端状态。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清王朝颠覆后，经过几十年战乱已经疲倦的中国社会，将循着中国历史的传统轨迹，走入新的大治。如果没有外来因素，这次大治也许能够延续几百年。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轮回的轨迹，它在战乱之后，又用没有硝烟、可照样是人杀戮人、人仇恨人的动乱，把中国历史的乱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动乱过去，虽然王朝稳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的官员却对皇帝失去了信任；而他们比文化大革命前更严重的单位专制和权力滥用，又造成了社会的强烈不满。所以，中国还没有跨上长期大治的新一轮历史轮回。

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当认识到，外来因素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轮回的条件。没有现代文明从西方国家的传入，清王朝不会在一百年前颠覆，我们今天还生活在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下。没有现代文明的传播，中国人不会有平等观念，官员滥用权力虽然会受到皇帝或暴民的约束，但皇帝一言九鼎的政治特权和三宫六院的生活特权，却不会遭到质疑。西方人最早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只用仅仅一百来年的短时间，就在中国传播的如此彻底，完全打破了两千多年来支撑中国专制制度的皇权观念：皇帝本人一言九鼎的政治特权和三宫六院的生活特权，不再被官员和民众视为天经地义的了。对比一下佛教在中国经过五百年方才立足的艰难过程，我们便很难否认，“民有、民治、民享”的观念特别切合中国人的心理。这就像中国古人发明的造纸和印刷技术，特别切合西方人亲眼阅读《圣经》的心理需要那样。皇权观念的打破，既意味着皇帝的天然合法性消失，也意味着官员不再在宗教意义上效忠皇帝：官员对皇帝的不信任具有了正当性。因此，官员成为民众之外威胁皇帝和民众的第三方力量。这是当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一个巨大差别。这个差别既导致了皇帝和民众对官员残酷斗争的文革，也导致了文革后来迅速瓦解。皇权观念被打破，天下不再为一人所私的看法普及之后，中国未来的长治久安的社会制度，便只可能建立在人与人平等的观念基础上。中国历史尽管还在轮回，但轮回的性质必须改变：它将不能够再在专制和暴民政治的“治乱”之间轮回，而必须转变成以人与人平等为前提的不同社会思潮互占上风的新型轮回。后一种轮回在转换时不需要通过人类自相残杀的暴力方式。所以，中国要跨入的长期大治，不可能是以往历史上的专制新朝代，而只可能是既没有皇帝专制也没有单位专制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也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最终消弭文革或暴民政治的合理性。而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今天，中国如何和平地跨入这样的大治，是对每一位中国执政者和普通中国人胸怀与智慧的考验。

我祈福中国、祈福我的每一位同胞！

## 德文译者为本文撰写的前言的中文翻译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被忘记。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的日子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些学者 2006 年春天在北京秘密聚会，媒体有一两篇提及它的文章，时不时出现一本关于这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的书 [例如前人民日报记者记希晨在其书《史无前例的时代》（北京，2006）里的记录] ——人们似乎并不想为纪念“十年浩劫”而做什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过少量关于文革的书籍。但当时和现在一样（见刚才引用的记者的书），这些事多以传记为重点。对受害者苦难的描述就像一条共同的线索贯穿这些作品。它们全力讲述的几乎都是北京权力圈成员的故事。虽然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幕后情形，但却掩盖了文革暴力在全社会的蔓延。另一方面，文革题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贯穿于一些“伤痕文学”作品中。当代作家偶尔也会涉足文革背景，例如几年前出版的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忏悔》。在这些书里，有时会出现值得注意的“加害者的视角”。

然而，中国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讨论，只是在中国政治气氛较为温和的时候偶尔发生。除此之外，主要是中国流亡者、台湾和香港的作家以及海外汉学家研究这个题目并发表一些作品。

胡景北最近发布在他的中文网站上的文章引发了读者的多种反应。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为过去的讨论注入新动力的一个尝试。

在文化大革命现象中看到一些好的地方，将自下而上爆发的暴力视为民主的冲动，这种想法在中国的讨论中并不新鲜，并且已经被“新左派”成员一再表述过。人们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它：根据我们西方的理解，就“有效运转的民主”来说，这些好的地方仍然缺少一两个基本要素：遵守民主程序、遵守法律、尊重个人尊严。但也许这正是胡景北这篇文章的目的：让人们更明确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对民主的需求是现成的；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清楚表现出来的民主冲动，是以不受规范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可这一民主冲动今天依然活跃在中国；中国人民最终必须开始思考，如何设计对国家、党和公民具有同等约束力的规范的民主进程。

(胡景北翻译/Übersetzt von Jingbei Hu/Translated by Jingbei Hu)

**Deutsche Übersetzung des ganzen Textes**

## **Die Kulturrevolution und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in China** **– zum 40. Jahrestag der Kulturrevolution**

Hu Jingbei (Shanghai)  
aus dem Chinesischen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Thomas Zimmer

*Die Kulturrevolution ist nicht vergessen, und doch ist der 40. Jahrestag ihres Ausbruchs in China nahezu unbemerkt vorübergegangen. Ein geheimes Treffen chinesischer Wissenschaftler im Frühjahr 2006 in Peking, der eine oder andere Hinweis in der Presse, hin und wieder ein Buch zu dem traurigen Jubiläum (z.B. die Notizen des vormaligen Reporters der Volkszeitung Ji Xichen unter dem Titel Ein Zeitalter ohne historisches Vorbild, Peking 2006) – man schien nicht viel Aufhebens um die Erinnerung an die „zehn katastrophalen Jahre“ machen zu wollen. Dabei hat es in den 80er Jahren schon einmal die eine oder andere Veröffentlichung zur Kulturrevolution gegeben, doch damals wie heute (vgl. die eben angeführten Notizen des Reporters) handelt es sich vielfach um Darstellungen mit biographischem Schwerpunkt. Wie ein roter Faden ziehen sich die Schilderungen vom Leid der Opfer durch diese Werke. Die häufige Konzentration auf Angehörige des Pekinger Machtzirkels erlaubt zwar interessante Blicke hinter die Kulissen, doch wird dabei die Sicht auf die Verbreitung der Gewalt in der Gesellschaft insgesamt verstellt. Literarisch ist das Thema Kulturrevolution dagegen in einigen Werken der „Narbenliteratur“ ebenfalls in den 80er Jahren umgesetzt worden, doch nehmen sich des Zeithintergrundes gelegentlich auch noch Verfasser unserer Tage an, wie das Beispiel des vor einigen Jahren erschienenen Buches Geständnisse eines Rotgardisten von Liang Xiaosheng zeigt, in dem interessanterweise einmal eine „Täterperspektive“ geboten wird.*

*Theore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der Kulturrevolution hat es in China dagegen nur gelegentlich zu Zeiten gegeben, in denen ein milderes politisches Klima herrschte. Ansonsten haben sich vornehmlich Exilchinesen, Autoren aus Taiwan und Hongkong sowie Sinologen mit dem Thema befasst und dazu etwas veröffentlicht.*

*Hu Jingbeis Artikel, der vor kurzem auf Hus chinesischer Internetseite erschienen ist und vielfältige Reaktionen der Leser ausgelöst hat, ist als der Versuch zu verstehen, der Diskussion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neue Impulse zu verleihen.*

*Der Gedanke, in den Erscheinunge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ch etwas Gutes zu sehen und die eruptive Gewalt von unten als demokratischen Impuls aufzufassen, ist in der chinesischen Diskussion nicht neu und immer wieder einmal von den Angehörigen der „Neuen Linken“ geäußert worden. Man mag das durchaus anders sehen: nach unserem westlichen Verständnis fehlt hier noch das eine oder andere fundamentale Element, um von einer „funktionierenden Demokratie“ sprechen zu können: die Beachtung eines demokratischen Verfahrens, die Einhaltung von Gesetzen, die Achtung der Würde anderer usw. Aber womöglich ist es gerade das, was Hu mit seinem Artikel bezweckt: das Bewusstsein dafür zu schärfen, dass ein Bedürfnis der Menschen in China nach Demokratie weiterhin vorhanden ist, dass der Impuls, der damals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schon deutlich existiert hat und dann allerdings in einer unregelmäßigen Form zum Ausdruck kam, noch wach ist und dass man in China heute endlich damit beginnen muß darüber nachzudenken, wie sich geregelte demokratische Abläufe entwerfen lassen, die für den Staat, die Partei und die Bürger gleichermaßen Verbindlichkeit besitzen.*

Im Jahre 1966, vor genau 40 Jahren, begann die „Groß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die Mao Zedong selbst in Gang gesetzt hatte und die er leitete. Ab diesem Jahr wurden an den Mittel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in ganz China keine neuen Schüler und Studenten mehr aufgenommen. Mehrere Millionen Absolventen der sechsjährigen Grundschule, die ursprünglich im Herbst 1966 hätten an den Mittelschulen Aufnahme finden sollen, mußten damit bis zum Jahr 1969 warten.

Ich hatte das Glück, im Jahre 1965 mit dem Besuch der Mittelschule begonnen zu haben, und obwohl es mir nicht beschieden war, die „Pariser Kommune“, die „Oktoberrevolution“ und „den Sieg über den Banditen Tschiang Kai-shek“ mitzerleben, so durfte ich mich doch glücklich schätzen, die Mittelschule besuchen zu dürfen und die Kulturrevolution sowie die „Erledigung Liu Shaoqis“ hautnah mitverfolgen zu können. Zig Millionen von Schülern, Studenten und Menschen überall in China übten sich bis 1968 in der Revolution. In diesem Jahr zeigte sich, dass man mit der Revolution in eine Sackgasse geraten war, es waren das Land und die Dörfer, die zum einzigen Rückzugsort für die Schüler und Studenten aus den Städten wurden.

In meiner Erinnerung umfasst die Kulturrevolution die beiden Jahre von 1966 bis 1968 – eben die Jahre, in denen es besonders stürmisch zuging, in denen man weder die Schule besuchte noch arbeitete, sondern in denen alle Schüler und Studenten zu Berufsrevolutionären wurden. Wenn heute von den zehn Jahren der Kulturrevolution die Rede ist, dann beinhaltet das auch immer die sieben Jahre von 1969 bis 1976. Doch recht betrachtet, sind diese sieben Jahre für die „Roten Garden“, die „Anhänger Kapitalismus“ und die Geschichte Chinas von keiner allzu großen Bedeutung, denn sie bildeten nur den schwachen Ausläufer einer anfangs mächtigen Bewegung. Die Kulturrevolution existierte zu dieser Zeit nur noch dem Namen nach und allein aus dem Grunde, da Mao Zedong nicht den Mut besaß, ihr Ende zu verkünden.

Heute, vierzig Jahre später, kann ich mich immer noch deutlich an den Tag des 18. Oktober 1966 erinnern, als ich gemeinsam mit einer Million Roter Garden Zeuge davon wurde, wie unsere Parade von Mao Zedong abgenommen wurde. Mir fällt dabei wieder eine Szene aus Tolstois *Krieg und Frieden* ein, in der Rostov bei der Abnahme einer Parade durch den Zaren denkt, daß diese ganze riesige Armee zusammen mit ihm, Rostov (der sich bei aller Verbundenheit mit der Armee doch auch nur als winzigen und unbedeutenden Teil von dieser empfand), auf ein einziges Wort des Zaren hin für diesen durch das Feuer gehen, Verbrechen ausüben, sich todesmutig in den Kampf stürzen oder vielleicht auch heldenhafte Erfolge erzielen würde. Im Roman überkommt Rostov beim Anblick jenes Mannes, der dieses

mächtige Wort verkörperte, ein Schauer. Jawohl, auch die Erinnerungen an die Kulturrevolution durch jene, die sie persönlich miterlebt haben, verursacht einem heute unwillkürlich Zittern und Herzklopfen. Tolstois Roman war vor Ausbruch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verboten. Wenn also jemand wie ich, der damals im Jahre 1966 dreizehn Jahre alt war nicht wusste, dass mittels einer riesigen Massenbewegung ebenso großartige und heldenhafte Erfolge auf der einen Seite wie grausame und abscheuliche Verbrech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hervorgerufen werden konnten, so mochte das angehen; aber sollten nicht wenigstens die Universitätsstudenten und die Erwachsenen, die Tolstoi gelesen hatten, davon etwas wissen? Unser Klassenlehrer war damals der Russischlehrer, der hatte doch bestimmt Tolstoi gelesen. Aber warum hatte er uns nicht beigebracht, dass die Aussage, eine „Massenbewegung besitzt von Natur aus Gültigkeit“ nicht unbedingt richtig war? Selbstverständlich wäre der Mann, wenn er diese Aussage damals zu Zeiten der Kulturrevolution gemacht hätte als Konterrevolutionär und Gegner der „Großen Proletarischen Kulturrevolution“ kritisiert und bekämpft worden. Doch warum hatte er mit uns nicht schon früher, bevor die Dinge so stark eskalierten, einmal über Tolstoi gesprochen? Heute bin ich selbst ein Erwachsener. Ich habe Tolstoi gelesen, und obgleich ich in einer Gesellschaft lebe, in der das Recht auf freie Rede beschnitten ist, muß ich doch anerkennen, daß es heute immerhin viel toleranter zugeht als zu den Zeiten der Kulturrevolution. Daher bin ich – immer eingedenk der Tatsache, dass man die Zukunft zwar nicht voraussagen kann, dass jedoch eine Wiederholung der Geschichte immer möglich ist – bereit, meine Erfahrungen über die Kulturrevolution mitzuteilen, und zwar nicht zuletzt den Jugendlichen und jungen Menschen, die die Kulturrevolution nicht verstehen können und denen auch mein Tagebuch aus jeder Zeit nichts mehr sagt.

Ich bin der Ansicht,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auf der einen Seite ein grausames Mittel darstellte, mit dem Mao Zedong die Herrschaft durch seine Person festigte; auf der anderen Seite stellte sie den barbarischen Versuch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dar, eine ideale Gesellschaft zu errichten. Einerseits stellte die Kulturrevolution dadurch, dass sie die Verwirklichung des Kommunismus im 20. Jahrhundert auf die Spitze trieb,

dessen Undurchführbarkeit unter Beweis; andererseits trieb sie die wechselhaften Veränderunge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ins Extreme und verlieh dem künftigen historischen Fortschritt Chinas damit mehr Veränderungsmöglichkeiten und mehr Risiken. Die Besonderh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besteht darin, dass sie eine Form des das ganze Volk umfassenden roten Terrors darstellt sowie eine Form teilweiser politischer Freiheit eben für das Volk. Ich werde meine Auffassungen zur Kulturrevolution und über ihre Verbindungen zu den historischen Kreisläufen in China besonders mit Blick auf diese beiden Besonderheiten entwickeln.

### **1. Die Kulturrevolution: Roter Terror**

Es steht vollkommen außer Frage,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eine der diktatorischsten Momente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darstellt. In dieser Zeit waren allein die Taten und Gedanken Mao Zedongs der einzig gültige Maßstab für das Handeln und Denken. Alle Handlungen, die gegen Maos Worte und Gedanken verstießen, galten als konterrevolutionär und wurden unverzüglich unter Gewaltanwendung bestraft. Ähnliche Momente hatte es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zwar bereits gegeben, doch war dabei nie solch ein hohes Maß an Gewalt w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n den Tag gelegt worden. Dies hatte seinen Grund darin,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im Vergleich zu den gewöhnlichen diktatorischen Erscheinungen in der Geschichte zwei klare Unterschiede aufwies: 1. Die Kulturrevolution trat in einer in höchstem Maße durchorganisierten Gesellschaft auf. Jeder Chinese war in Arbeitseinheiten der Fabriken, Schulen, Produktionsbrigaden usw. organisiert. Selbst die Belange der Alten und Kinder wurden in den Einwohnerkomitees oder den Produktionsbrigaden geregelt. Mittels eines Organisationssystems, das die Gesellschaft vollkommen durchdrang, gelangten die Gedanken Mao Zedongs vollkommen bis in die letzten Winkel der Gesellschaft. Da jeder jeden überwachte, konnten alle abschätzigen Worte und Taten

gegenüber Mao Zedong aufgedeckt und öffentlich bestraft werden. Die Roten Garden stellten dabei eine jugendliche Massenorganisation dar, in der man Mao Zedong vollkommen verehrte. Es war eine ihrer obersten Aufgaben abschätzigste Worte und Taten aufzudecken und zu ahnden. 2. Die Menschen in China erkannten die Herrschaft Maos nicht nur in ihren Gedanken an, sondern identifizierten sich mit ihr auch emotional. Mao Zedong galt als der große Retter Chinas. Jeden Morgen hörte man die Melodie „Der Osten ist rot“, die als eine „Vertonung der Worte des Vorsitzenden Mao“ eine der großen Besonderheiten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darstellte. Überall fanden Veranstaltungen statt, auf denen Menschen z.B. über die „Bitternis in der alten Gesellschaft“ klagten und der „Errungenschaften des neuen China“ gedachten. Oder man ließ sich über die eigenen seelischen Veränderung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Niederrückung egoistischer Gedanken“ und der „Kritik am Revisionismus“ aus. Die totale Beherrschung selbst rein individuell-menschlicher Bereiche wie Schule und Studium, Arbeit, Kleidung und Freizeit – ja sogar die Liebe (d.h. die proletarische Liebe) durch die Politik führte dazu, dass gleichzeitig mit der starken Unterdrückung der alltäglichen Gefühle der Menschen die Bedürfnisse nach Liebe und seelischer Anteilnahme in individuelle Gefühle gegenüber Mao Zedong verwandelt wurden. Es war vor allem dieser zweite Aspekt, demzufolge die Überwachung jedes Menschen durch jeden anderen zu einem ganz bewußten Verhalten im Volke wurde. Und es war auch dieser zweite Aspekt, der später nach dem Tode Mao Zedongs dafür sorgte, dass Menschen, die Mao niemals persönlich begegnet waren, in großes Wehklagen ausbrachen und viele Tränen vergossen. Auch dass die Roten Garden, die nach 1968 viel durchzumachen hatten, ihre Gefühle gegenüber Mao Zedong nicht aufgeben konnten gleich der Mehrheit der Menschen, die die erste Liebe nicht vergisst, hat eben hierin ihre Ursache.

Der Charakter der Herrschaft, d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sgeübt wurde, lässt sich mit einem Wort folgendermaßen umschreiben: „Roter Terror“ – übrigens eine Vokabel, derer sich die Roten Garden mit Stolz bedienten und die eine Art und Weise der Revolution bezeichnete, mit der die Verwirklichung der revolutionären Ideale garantiert wurde. Der Rote Terror stand im Gegensatz zu dem, was die Roten Garden

mit Blick auf die 20er und 30er Jahre in China als den „Weißen Terror“ bezeichneten. Doch der Weiße Terror jener Zeit hatte immerhin noch dem Schriftsteller und Lehrer Lu Xun (1881-1936) eine Existenz ermöglicht, auch konnten die Professoren öffentlich ihre Ansichten verbreiten und bekunden, dass ihre Konzepte dem Marxismus zuzurechnen waren. Der Rote Terror dagegen legte fest, dass alle Worte und Taten, die nicht marxistisch waren, Ansichten darstellten, die gegen die Groß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gerichtet waren. Daß solche Worte und Taten nicht öffentlich kundgetan werden durften,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Doch selbst Partner, Kinder und Freunde, denen privat derartiges zur Kenntnis kam, waren aufgefordert, die Person, die das geäußert hatte, bekanntzugeben, denn derartige Äußerungen standen unter Strafe. Wichtiger ist aber, dass diese Bestrafungen zuallererst gewaltsam vorgenommen wurden und nicht auf die sprachliche und administrative Ebene beschränkt blieben. Daher trifft die Feststellung zu, dass der Rote Terror ein neues Ausmaß an Terror darstellte, wie man es bis dahin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nicht gekannt hatte. Selbstverständlich war es auch vor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erlaubt gewesen, nicht marxistische Auffassungen in der Presse und in den Hörsälen vorzutragen. Doch die Kulturrevolution wurde in dieser Hinsicht zu einem Extrem. Außer Mao Zedong und seinem Stellvertreter Lin Biao (1907-1971) musste jeder befürchten, da seine Schriften womöglich einmal einer kritischen Überprüfung unterworfen würden. Die Worte und Taten ganz gleich von wem konnten einer schonungslosen Offenlegung unterzogen werden, um zweifelhafte Dinge ans Tageslicht zu bringen, die gegen Mao gerichtet waren. Wurde tatsächlich etwas gefunden, dann musste der Betreffende nicht nur den Verlust seiner Würde befürchten, sondern hatte auch körperliche Verletzungen hinzunehmen. Der Selbstmord von vielen Schriftstellern und Intellektuellen wie Lao She (1899-1966) oder Fu Lei (1908-1966) in der Z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der Tod von zahlreichen Männern wie Staatspräsident Liu Shaoqi (1898-1969) und dem ehemalig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ng Dehuai (1898-1974) hatte sicherlich nicht nur etwas mit dem Verlust der Würde zu tun, sondern lag zuvorderst daran, dass sie die körperliche Peinigung nicht länger ertragen konnten. An der Mittelschule Nr. 9, die ich in Nanking besuchte, haben sich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eine ganze Reihe von Lehrern umgebracht. Der direkte Grund dafür war nicht die Kritik an ihnen auf Wandzeitungen, sondern die Gewalt, die man ihnen gegenüber ausübte oder mit der man ihnen drohte. Die Herrschaft, d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sgeübt wurde, war in besonderem Maße eine des Terrors, dies steht nicht nur heute außer Frage, daran wird auch in tausend Jahren niemand zweifeln können. Ganz gleich welche festlandschinesische Zeitung aus der Zeit zwischen 1966 und 1968 man aufschlägt – der erste Eindruck, den der Leser erhält, ist der des Terrors, der der absoluten Macht Maos, erkennbar allein schon an apodiktischen Bemerkungen wie der, daß Maos Äußerungen „Satz für Satz die Wahrheit“ bedeuteten. Weiter ist da noch die Form höchster Verehrung gegenüber Mao Zedong durch die Roten Garden und die gewöhnliche Bevölkerung Chinas anzuführen sowie die willkürliche Bezeichnung von Menschen als „kapitalistische Parteigänger“ oder „Ochsendämonen“ und „Schlangengeister“ und die daraus folgende Bestrafung. Das alles war Ausdruck eines inhumanen und vollkommen irrationalen Terrors.

## **2. Teilweise politische Freiheit**

Gleichzeitig mit der Konstatierung des Terror-Charakters der Kulturrevolution möchte ich auf den Aspekt der Freiheit verweisen. Im offiziellen Sprachgebrauch handelte es sich bei der Kulturrevolution um „Unruhen“. Unruhe führt zu heftigen Bewegungen, heftige Bewegungen wiederum legen Freiheiten nahe, sind ohne Handlungs- und Bewegungsfreiheit nicht vorstellbar. Wer wollte heftige Bewegungen ohne die Freiheit der Gedanken ausführen? Erst wenn man die Freiheit dazu hat, kann man sich ungehindert bewegen. Erst die unbehinderten Bewegungen von mehreren hundert Millionen Chinesen führten zu Unruhen. Doch die Freiheit der Handlung und der Gedanken, von der hier die Rede ist, muß mit den Phänomenen der Herrschaft und des Terrors, von denen im vorstehenden Abschnitt die Rede war, in Einklang gebracht werden. Ansonsten bleibt uns die Kulturrevolution unverständlich.

Die chinesische Herrschaft wird oft in abstrakter Form als staatliche Herrschaft oder als kaiserliche Herrschaft bezeichnet. Dies trifft zwar zu, doch muß noch konkret die soziale Herrschaft ergänzt werden. In China ist jede Arbeitseinheit despotisch, und die Regierung auf jeder Ebene verhält sich gegenüber denen, die von ihr regiert werden despotisch. Ein Chinese lebt nicht nur in einer abstrakten staatlichen Herrschaft, er lebt auch in der konkreten Herrschaft, die von der Arbeitseinheit und dem Einwohnerkomitee ausgeübt wird. Die Herrschaft, die ein gewöhnlicher Chinese im täglichen Leben erfährt, ist nicht die staatliche Ebene der Herrschaft, sondern die Herrschaft, wie sie von der Führung in Unternehmen, Dörfern, Behörden, Lehreinrichtungen und dem Einwohnerkomitee ausgeht. In der Mehrzahl der Fälle wird ein gewöhnlicher Chinese nicht die im täglichen Verkehr erfahrene Form der Herrschaft direkt mit der staatlichen Herrschaft in Verbindung bringen. In China schätzt man die Figur des aufrechten Richterbeamten Bao Qingtian. In den klassischen Erzählungen und Romanen wird gerne beschrieben, wie die Menschen die Sänfte der Beamten aufhalten und ihre Klagen vorbringen. Der Grund dafür ist, dass es in den Augen der gewöhnlichen Chinesen eine riesige Diskrepanz zwischen der selbst erfahrenen Herrschaft in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staatlichen Herrschaft, die sich in der kaiserlichen Herrschaft der Hauptstadt manifestierte.

Die konkrete gesellschaftliche Herrschaft bildet zwar die Grundlage für die staatliche Herrschaft, aber die Tendenz des Machtmissbrauchs der Regierungsgewalt auf jeder Ebene ist insofern folgenreich, als dadurch nämlich das Vertrauen der Menschen in die Herrscher des Staates und in die staatliche Gewalt überhaupt gefährdet wird. Aus diesem Grunde griffen die Kaiser zu allen möglichen Maßnahmen, um den Machtmissbrauch durch die regionalen Instanzen und Einrichtungen zu unterbinden. Alle diese Maßnahmen wurden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immer von oben verordnet. Allein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wurden die Maßnahmen von unten aus unternommen, oder vielleicht treffender formuliert: die Maßnahmen wurden in einem erheblichen Maße von unten aus unternommen. Das, was in bezug auf die Kulturrevolution mit der Floskel „historisch beispiellos“ bezeichnet wird, ist gerade dieser eben genannte Aspekt. Ich rufe mir noch einmal die Kulturrevolution in

Erinnerung. Die erste Person, die damals an der Mittelschule, die ich besuchte, öffentlich attackiert wurde, war der Rektor. Dabei handelte es sich vermutlich um eine Entscheidung der städtischen Erziehungsbehörde, also um eine Anordnung von oben. Doch in der Folge gerieten auch der Parteizellensekretär der Schule, sein Stellvertreter, der stellvertretende Rektor und der Studienleiter ins Feuer der Kritik. Nun könnte man zwar sagen, hierbei habe es sich um eine „großartige strategische Planung“ von Mao Zedong gehandelt, doch zumindest die Art und Weise, wie diese Planung umgesetzt wurde, war Sache unserer Schule – nämlich die freie und furchtlose Offenlegung und Bekämpfung der „revisionistischen“ Worte und Taten der Schulbeamten durch unsere Schüler und Lehrer. In der Tat verhielt es sich so, dass die städtische Erziehungsbehörde als Teil der örtlichen Regierungsgewalt damals bereits gelähmt war. Der Behördenleiter und weitere leitende Beamte waren bereits zu „kapitalistischen Mitläufern“ abgestempelt worden und konnten daher unmöglich noch Anweisungen zur Kulturrevolution in der Schule geben. Doch einmal angenommen, die Behördenleitung wäre noch nicht kaltgestellt worden und hätte Anweisungen gegeben – die Schüler hätten das mit einer argwöhnischen, kritischen Haltung aufgenommen und diese Anweisungen wohl sogar abgelehnt, denn schließlich waren es keine Anweisungen vom „Vorsitzenden Mao“ und dem „Stellvertretenden Vorsitzenden Lin“ selbst.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verhielt es sich in allen Arbeitseinheiten und in allen lokalen Regierungsinstanzen auf diese Art und Weise. Mao Zedong konnte zwar z.B. den ersten KP-Sekretär Shanghais, Chen Pixian, als Anhänger des Kapitalismus bloßstellen, doch er wusste nicht, wer in der Shanghaier Erziehungsbehörde oder wer im Huangpu-Distrikt ein kapitalistischer Anhänger war. Dies verlieh den Roten Garden und den Massen ein großes Maß an Freiheit. Sie konnten frechweg die Worte und Taten der Leiter von Behörden und Distrikten einer Prüfung unterziehen. Wenn dabei revisionistische Tendenzen festgestellt wurden, konnten die Leiter sofort abgesetzt werden. Wenn wir also den despotischen Charakter der Kulturrevolution konstatieren, dann sollten wir nicht übersehen, dass die Massen in dieser Zeit eben auch teilweise politische Freiheit genossen.

George W. Bush hat einmal gesagt, dass der größte Fortschritt der Menschheit in mehreren tausend Jahren der sei, die Herrschenden in Käfige gesperrt haben zu können, damit sie von dort aus versuchten Macht auszuüben. Selbstverständlich muß dieser Käfig geschlossen sein, auch ist er nicht nur für Präsident Bush gemacht, sondern auch für die Beamten aller Regierungsebenen, die Unternehmensführer und die Schulrektoren.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wurden alle Machthaber Chinas aus den Einwohnerkomitees, Fabriken, Schulen, aus den Kreisbehörden bis hin zu den Provinz-, Stadtbehörden und dem Staatsrat in Käfige gesperrt. Ausgespart davon blieben nur Mao Zedong und Lin Biao. Aber war das noch nicht genug für die gewöhnlichen Chinesen? War solch eine „Große Demokratie“ (ein Standardbegriff aus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eine Form der Demokratie?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hat man sich in allen Dynastien gegen bestechliche und korrupte Beamte gewandt, doch wann war es je vorgekommen, dass die Mehrzahl der Beamten von den Massen des Volkes in freier Form bloßgestellt und bekämpft wurde? Das hat es nur einmal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gegeben!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galt es als kapitalistisch, wenn jemand außergewöhnliche Kleidung trug, besser aß als andere oder mehr als gewöhnliche Ansprüche stellte. Selbst Ehepaare, die auf der Straße Hand in Hand gingen, mussten sich den Vorwurf kapitalistischen Verhaltens gefallen lassen. Revisionismus war nur ein etwas schwächerer Begriff als Kapitalismus. Doch gleichzeitig mit der Gegnerschaft zu den kapitalistischen Tendenzen in der ganzen Gesellschaft war der Schwerpunkt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die Kritik an den kapitalistischen Machthabern innerhalb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h. an den mächtigen Beamten und Kadern in Regierung und Partei. Vor der Kulturrevolution hatte es die heute so häufig auftretenden Erscheinungen unter den Beamten wie Vetternwirtschaft, Korruption, Bestechlichkeit, Eigenmächtigkeit und Despotismus, Ruhmsucht, Falschheit und Betrug eher selten gegeben. Sobald ein Beamter auch nur die materiellen Vorzüge hervorhob (und sei es, daß er gar nicht einmal die eigenen materiellen Vorteile meinte), oder wenn er sich über seine Arbeit beklagte, bzw. wenn er die „Durchsetzung der revolutionären Linie Mao Zedongs“ nicht mit Nachdruck verfolgte, so wurde er zum kapitalistischen

Anhänger abgestempelt – ganz zu schweigen von dem, was ihm blühte, wenn er das heute so gängige Verhalten von Vetternwirtschaft, Korruption und Degeneriertheit an den Tag legte. Doch sei es drum, selbst wenn die Beamten vor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jenes Maß an „Schlechtigkeit“ an den Tag legten wie heute, so blieb die Frage, wie man sie kontrollierte und überprüfte doch ein riesiges Problem für China. Uns ist bekannt, daß Machtmißbrauch, gesellschaftliche Verkommenheit und moralischer Niedergang sich zuallererst bei den dem Kaiser unterstellten Beamten der Regierungsbehörden jeder Ebene bemerkbar machen und nicht etwa beim Herrscher selber. Aus diesem Grunde war es für den Kaiser notwendig, die Beamten zu überwachen. Von diesem Blickwinkel aus betrachtet handelte es sich bei der Kulturrevolution um eine Bewegung großen Ausmaßes, bei der das üble Gebaren der dem Kaiser unterstellten Beamten einer Maßregelung unterzogen wurde. Der Unterschied zu den gleichartigen Bewegungen der Herrscherdynastien bestand nur im Sprachgebrauch: im Sprachgebrauch der Kulturrevolution wandte man sich gegen die kapitalistischen Machthaber, wohingegen früher vom Kampf gegen die korrupten Beamten die Rede gewesen war.

Über die Kulturrevolution hatte Mao Zedong einst gesagt, daß er nach 1949 viele Methoden ausprobiert hatte, doch immer gescheitert war; erst mit der Kulturrevolution habe er die richtige Methode gefunden. Von Mao stammte ebenfalls der Ausspruch, daß die Kulturrevolution keineswegs eine einmalige Angelegenheit darstelle, sondern in der Zukunft immer wieder – etwa alle sieben bis acht Jahre einmal – auftreten werde. Ein Freund aus der Mittelschule bemerkte dazu einmal, daß, wenn wirklich alle sieben bis acht Jahre einmal eine Kulturrevolution stattfinden sollte, es sehr gefährlich würde, Beamter zu sein. Und wie auch nicht: um wie viel vorsichtiger wären wohl heute all die Regierungsbeamten, die Unternehmensleiter, Dorfvorsteher, Kreisleiter und Schulrektoren, wenn sie wüßten, daß ihnen nach sieben oder acht Jahren wieder eine Kulturrevolution bevorsteht. Sieben, acht Jahre – das ist nur wenig mehr als die fünfjährige Amtszeit eines französischen Präsidenten oder die achtjährige Zeit von zwei Legislaturperioden für Abgeordnete und Parlamentarier in den USA und Deutschland. Anders herum gesprochen: wenn man die Beamten und

Regierungskader alle sieben oder acht Jahre einmal in einen Käfig sperrt und der freien, furchtlosen Kritik durch das Volk aussetzt, dann ist das bei aller Verschiedenheit gar nicht so viel anders wie die Neuwahl von Abgeordneten im Westen alle vier oder fünf Jahre. So gesehen weist die in China erfundene und von unten ausgehende freiheitliche Kritik an den Beamten durchaus Ähnlichkeiten mit den freiheitlichen Wahlen auf, die im Westen erfunden worden sind.

### **3. Die Kulturrevolution und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in China**

Als die Kulturrevolution 1976 offiziell beendet wurde, strich man das Recht auf die „Vier Großen Freiheiten“ (die Freiheit des Streits zwischen verschiedenen Schulen, die Freiheit der Zulassung einander widerstreitender Meinungen, die Freiheit der Meinungsäußerung auf Wandzeitungen und die Freiheit des Debattierens) und das Streikrecht aus der Verfassung. Das Ziel der Kulturrevolution war es gewesen, die höchste Alleinherrschaft des Staates zu sichern. Die Mittel dazu waren die gewaltsame Verletzung der Würde des Menschen und Terror, mit dem aus kleinen Fehlern große Vergehen gemacht wurden. Die Methoden, mit denen das Volk unter Ausnutzung partieller politischer Freiheiten die Kader und Beamten in die Schranken gewiesen hatte, waren unzivilisiert und bössartig gewesen. Es hatte sich um eine Form unkontrollierter Volksgewalt gehandelt, die deshalb auch abgeschafft werden sollte. Doch in China wurde in der Folge keine neue Form gefunden, mit der man die Kader und Beamten unter Kontrolle hielt, vielmehr ging man erneut dazu über, die Beamten wie früher von oben herab zu gängeln und zurechtzuweisen. Da sich die Form der Ausübung von Alleinherrschaft im Lande nicht geändert hatte, kamen schnell wieder die Herrschaft durch die Arbeitseinheiten und durch die Gesellschaft auf – und nicht nur das, diese Herrschaft wurde noch stärker als vor der Kulturrevolution. Auf diese Weise verloren die Menschen ein weiteres Mal die gesamte politische Freiheit. Im

heutigen China gibt es nicht einmal mehr die traditionelle Form der Unmutsäußerung gegenüber der Obrigkeit, bei der man früher „die Sänfte der Beamten aufhielt und seine Klagen vorbrachte“. Doch solange es für die Menschen weiterhin keine Möglichkeit gibt, die Beamten wirksam in die Schranken zu weisen, und solange die Menschen noch unter der Herrschaft der Arbeitseinheiten leben – so lange wird die Kulturrevolution als Erinnerung in den Menschen weiterleben, und nicht nur das, sie wird sogar etwas sein, das sich die Menschen herbeisehnen. Für die Kader und Beamten wird daraus ein Alptraum, den sie nicht beseitigen können. Wenn China also die Anziehungskraft, die die Kulturrevolution immer noch auf die Menschen ausübt, beseitigen möchte, und wenn die Kader und Beamten den Alptraum durch die Kulturrevolution loswerden möchten, dann muß eine neue Form gefunden werden, mit der man die Beamten und Kader in Käfige einsperrt.

Die Zurechtweisung der Beamten von oben aus hat in China eine lange Tradition. Um gegen einzelne Beamte vorzugehen, die ihre Macht missbraucht haben, ist diese Methode sehr effektiv. Doch sobald der Machtmissbrauch eine allgemeine Erscheinung unter den Beamten wird, ist diese Methode wirkungslos.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ist es immer wieder einmal vorgekommen, dass von unten der Wunsch kam, hohe Beamte in der Umgebung des Herrschers auszuschalten. Doch kommt diesem Vorgehen, wenn die lokalen Adligen den Kaiser zwingen bestimmte Beamte zu maßregeln keinerlei systematische Bedeutung zu, und es ist etwas ganz anderes wie wenn sich die Massen erheben, um die Initiative gegen Beamte zu ergreifen.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wurde es immer als eine Revolte aufgefasst, wenn sich das Volk erhob: Dynastien wurden auf diese Weise gestürzt, oder nahezu zum Sturz gebracht. Die Kulturrevolution stellte eine absolut neue Art und Weise dar, wie der Kaiser und das Volk Hand in Hand gegen die Beamtenschaft vorgingen. Das Volk erhob sich dabei, doch die Dynastie blieb stabil und intakt. Auf diese Weise wurden dem Volk, das keinerlei Bestrebungen machte die Dynastie zu stürzen, Hoffnungen gemacht, seinem Unmut über all das Unrecht loszuwerden und die Unterdrückung durch die Gesellschaft abzuschütteln. Heute, da diejenigen, die die Kulturrevolution selbst miterlebt haben, zum größten Teil noch leben, ist die

Katastrophe dieses Ereignisses noch frisch in jedermanns Erinnerung, und daher wird sich die gerade beschriebene Hoffnung nicht weiter entwickeln können. Doch mit der Zeit, wenn die leidvollen Erinnerungen immer schwächer werden, wird die Erinnerung an das Glücksgefühl, das sich einst bei dem furchtlosen Vorgehen gegen die Beamten einstellte immer stärker werden, werden die Hoffnungen, die man in der Z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hatte und die Sehnsucht nach dieser Zeit womöglich wachsen. So gesehen stellt die Kulturrevolution für die künftige Entwicklung der Gesellschaft Chinas durchaus einen neuen Unsicherheitsfaktor dar.

Für mich stellt die Kulturrevolution innerhalb der Entwicklungszykle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eine extreme Situation dar. Angenommen die Kulturrevolution hätte niemals stattgefunden, dann wäre die von den jahrzehntelangen krieger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en ausgelaugt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die im Gefolge des Sturzes der Qing entstanden waren, wiederum auf die traditionellen Bahnen der Entwicklung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zurückgekehrt und in ein neues Herrschaftszeitalter eingetreten. Ohne einen Einfluß von außen hätte sich dieses Herrschaftszeitalter dann womöglich über ein paar hundert Jahre halten können. Die Kulturrevolution hat die zyklischen Bahne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verändert. Nach dem Abklingen der militärischen Kämpfe und Unruhen hat sie – zwar ohne Pulverdampf, doch dafür mit den für Zeiten der Unruhe typischen Erscheinungen von Mord, Hass und Gewalt – das Chaos auf ein bis dah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unbekanntes Maß getrieben. Als daher die Unruhen vorüber waren, war die Dynastie zwar noch intakt, doch die Beamten, die in der Z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gelitten hatten, hatten das Vertrauen gegenüber dem Kaiser verloren. Die im Vergleich zu den Zeiten vor der Kulturrevolution schlimmer gewordene Herrschaft durch die Arbeitseinheiten und der Machtmissbrauch riefen selbstverständlich den Unmut der Bevölkerung hervor. Aus diesem Grunde kann man sagen, dass China noch nicht in einen neuen Zyklus einer langfristigen großen Herrschaftszeit eingetreten ist.

Auf der anderen Seite sollten wir akzeptieren, dass äußere Faktoren die Bedingungen für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Chinas grundlegend verändert haben. Ohne den Einfluß der westlichen Kultur wäre die Qing-Dynastie nicht vor einem Jahrhundert

zusammengebrochen, würden wir heute noch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mandschurischen Kaiserhauses leben. Ohne den Einfluß der westlichen Kultur gäbe es in China keine Vorstellung von Gleichberechtigung. Der Machtmissbrauch durch die Beamten würde zwar vom Kaiser oder durch Volksaufstände beschränkt, doch weder alleinige Entscheidungsbefugnis des Kaisers noch die Sonderrechte der Bürokratie würden angezweifelt. Es hat gerade einmal hundert Jahre benötigt, dass die aus dem Westen stammenden Vorstellungen „durch das Volk“, „dem Volk“ und „für das Volk“ in China Verbreitung gefunden haben. Auf diese Weise sind in China die mehr als zweitausend Jahre alte Herrschaftsvorstellungen abgeschafft worden. Wenn man das mit dem mühsamen Ausbreitungsprozeß des Buddhismus in China vergleicht, dann ist unschwer zu erkennen, dass die Vorstellung von „durch das Volk“, „dem Volk“ und „für das Volk“ in besonderem Maße der inneren Verfassung der Menschen in China entspricht. Dies ist wie die chinesische Papierherstellung und Drucktechnik, die in besonderem Umfang den inneren Bedürfnissen der Menschen aus dem Westen bei der Lektüre der Bibel entsprechen. Auf der Grundlage des Konzeptes der Gleichheit zwischen den Menschen spielt sich die chinesische Geschichte zwar noch in Zyklen ab, jedoch hat sich die Qualität der Zyklen gezwungenermaßen verändert. Die Geschichte Chinas kann sich nicht mehr nur zwischen der Herrschaftsausübung und der Politik der Bekämpfung von Unruhen durch das aufständische Volk bewegen. Im Gegenteil: die chinesische Geschichte muß sich in einen neuen Kreislauf begeben, bei dem sich verschiedene geistige Strömungen in der Gesellschaft gegenseitig im Gleichgewicht halten, die unter der Voraussetzung der Gleichberechtigung der Menschen entstanden sind. Bei letztgenanntem neuen Kreislauf sind in Zeiten des Wandels dann auch nicht mehr gegenseitiger Mord und Gewalt notwendig. Wenn China also in eine lang anhaltende Herrschaft eintreten möchte, dann kann es keine neue dynastische Herrschaft in der überlieferten historischen Form sein, sondern nur eine in der Form einer freiheitlichen, demokratischen und auf Recht und Gesetz gegründeten Gesellschaft, in der es Monopolgewalt durch den Staat und die Arbeitseinheiten nicht mehr gibt. Nur so kann in China womöglich am Ende die Rationalität von Erscheinungen wie der

Kulturrevolution und brutaler Volksgewalt beseitigt werden. Wie der Wandel zu solch einer Herrschaft auf friedliche Weise zu bewerkstelligen ist, dies stellt die Herrschenden und die Gemeinen in China gleichermaßen vor eine große innere Prüfung und eine Prüfung ihrer Weisheit.

Ich bete für China und für jeden meiner Landsleute!

## **Impressum**

Jingji fazhan wenlun Nr. 2/2007 vom 20. Juni 2007

Arbeitspapiere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Working Pap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N-Nr. 1860-2207

Herausgeber: Prof. Dr. Jingbei Hu

Redaktion: Prof. Dr. Jingbei Hu

Verlag: Verlag China Translation Bonn

Druck: Deutsche-Ban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Shanghai, VR China

Jingji fazhan wenlun (Arbeitspapiere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Working Paper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t das offizielle Organ des Deutschen-Bank-Lehrstuhls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und des 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am CDHK

Internet-Adresse: [www.hujiangbei.net](http://www.hujiangbei.net)

E-Mail-Adresse: [jbei hu@mail.tongji.edu.cn](mailto:jbei hu@mail.tongji.edu.cn)

Tel.: +86 (0)21 6598 0687

文章免费使用声明/Erklärung der Freinutzung/Declaration on free use:

本文论所发表的文章，可以由使用者免费用于非商业性用途尤其是学术研究。

Alle Papiere, die in dieser Reihe erschienen, können für eine nicht-kommerzielle Nutzung und besonders für akademische Forschungen frei verwendet werden.

All papers appearing in this series can be used freely for non-commercial uses and particularly for academic research.